

历史学家齐思和

戚国淦 寿纪瑜

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忠诚的教育家，淹博的历史学家。他毕生耕耘，成果累累，为历史科学研究和史学人材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

齐思和先生原籍山东省宁津县，1907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齐璧亭老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美国，毕生从事教育事业。齐璧亭关心妇女教育，创办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是当时少有的几所女子高等学校之一。他担任院长，殚精办校，培养出大批人材。建国后党和人民为酬答他的卓著贡献，推选他为河北省政协副主席。青年时期的齐思和生活在家庭里，无论在品德还是在知识方面都受到良好的培养。

1921年齐思和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这所学校素以校风好、师资强著称，后来成为新中国史学大师的范文澜当时即在该校任教。在经学方面他深得范师的启迪，由于明敏好学深获赏识。中学毕业进入南开大学。一年后，听从范师的指教，离开天津，来到人文荟萃的北平，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

当时燕大历史系已具规模，任教的有洪业、邓之诚、王桐龄、陈垣、张星烺、顾颉刚等，均为国内名家；外籍教授如王克私博士等，也各有专长。齐思和得到名师指点，学识突飞猛进。他的同学在《燕大年刊》上为他的毕业照片题词说：“于学无所

不窺，上自群经诸子，下至康、梁、胡、顾；每一书，必有新奇问题发现，尤精于考证学，史学方法，两汉历史，”洵非虚语。1931年毕业后，以成绩优异被选派赴美留学。

齐思和赴美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历史。30年代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的鼎盛时期，“明星教授”云集，阿波特、施莱辛格、摩里森等著名学者，都在此任教。齐思和在这些教授指点下从事欧美历史的研究，学业更形精进。1935年获博士学位，返回祖国。

值得注意的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由鲁滨孙倡导的“新史学派”在美国兴起。这一学派以重新研究以往各个文明并恢复其原来面貌和研究现时秩序之由来为己任，以区别于以前的惯于以政治史为骨干，以民族史为范围的旧史学。齐思和留学美国时，鲁滨孙依然在世，上面提到的施莱辛格教授即是这一派的健者。这种观点在美国风行一时，而且影响到中国史学界。1963年齐思和将鲁滨孙所著《新史学》加以重译，并撰写序言，对这一派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做了评论。

齐思和归国后首应北平师范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同时在其他大学兼课。两年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师大内迁，他返回母校任教，并兼任历史系主任。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遭日军封闭，转入私立中国大学执教。抗日战争胜利后，燕大恢复，他重返母校，同时兼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建国以后，燕京大学于1952年与北京大学合并，复转入北大历史系，后又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直至1980年2月逝世。

齐思和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北平沦陷以后，在祖国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他讲学燕园，宣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阐述世界大战中敌我形势，对学生循循善诱，勉励他们将来成为有用之材。燕京大学为日军占领后，他拒绝敌伪之聘，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由于薪俸菲薄，又到天津私立工商学院兼课，每周风尘

仆仆，往返于平津道上。但是由于家口众多，子女幼小，而沦陷区物价飞涨不已，全家节衣缩食，勉力维持，甚至有时他们夫妇亲自挽车赴煤栈购煤，以节省运费。齐思和处此困境，大节凛然，闭户读书，以待光复。

建国前，他已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当时英国某著名大学曾聘请他为该校教授，但是为了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祖国，他谢绝了这次重金礼聘。

建国后，齐思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他虽已年逾不惑，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坚持不懈，热情不亚于青年。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到70年代《马恩全集》全部出齐的时候，他竟尔在卧病中坚持完成了通读计划。至于革命导师的一些关于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直接论述，更是反复钻研，不知精读了多少遍，并且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贯彻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

二

齐思和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所授课程包括中国史古代诸段、世界史从古至今诸段兼及英美国别史、史学史、思想史等不下十多门。他讲课材料丰富，精彩纷呈，旁征博引之余，时有新解。特别是他留美归来后在师范大学首开的世界现代史课，内容新颖，备受欢迎。抗战爆发后，在燕京大学续授此课，当时大片国土沦陷，孤悬于敌占区的燕大，消息隔绝。听课者从这门课程中得以了解二次大战的由来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深受鼓舞。所以在他讲课的大阶梯教室里，听众总是满坑满谷。

对于教材的建设齐思和十分重视，而且做了许多工作。中国史方面，各种典籍，汗牛充栋，专著通史亦复不少，堪供学者阅读。而世界史教学，往往使用国外的教科书，国人著作，寥若晨星，学生深感可资参考者太少。这种情况直到建国初期无大改

变。他最初编写的一部教材是1935年在师范大学讲授世界现代史时为该课编写的。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当时国外出版这方面的著作为数寥寥无几，国内也不曾有人编写。他采取了与国外著作不同的编纂方式，编发讲课提纲，附带原始资料（均英文）作为讲义。到1938年，这部零散的讲义已汇集成书，由燕大历史系出版。以后随国际形势变化，重加修订，到1940年再版时，已成为16开本600页的巨册。该书所述始自一次大战结束，止于二次大战爆发，综述国际形势而外，兼及欧美主要国家两次大战间的历史发展，内容堪称丰富，足与此时刚刚问世的凯茨和朗森所编两书相媲美。随着势易时迁，此书已归陈旧，但是作者的开创之功，仍不可没。而其所选录的原始材料，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1952年院系调整后，齐思和到北大任教，后又主持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分工讲授世界中世纪史。当时这门课程缺乏教材，他决心自行编写。此时大家对于系统的理论学习，都处于开始阶段，理论的运用不无困难。齐思和讲课之暇，奋力编纂，在短短一年间编成一部二十七、八万字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后来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本学科在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自编教材，曾为不少高校所采用。

1960年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以后，开始统一编写世界史教科书。齐思和根据分工，主编上古分册。当时承担本书各章撰稿的同志多数是中年或青年教师。他悉心擘划，周密安排，团结同志，通力合作，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任务。这是我国史学界发挥集体力量编写的第一部多卷本世界通史的首卷。编者写出中国的特色做了努力，其中有关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部分，材料翔实，水平尤高。今天这本书仍供各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之用。

齐思和在讲授世界史时十分重视史料的介绍。当时各校图书馆收藏外国史资料不多，学生不易找到，也难于阅读。他配合教学，精选典型材料，和助手一道编译成《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和

《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两个分册，收入《世界史资料丛刊》，对于教学和科研均有助益。

他对学生热情关怀，循循善诱，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史学人材。“文革”过后，他虽已缠绵病榻，依然念念不忘为四化贡献力量，当听到各大学招收研究生的计划时，仍然壮心不已，打算承担任务，为国家再多培养一些人材。可惜病情日重，这一愿望未能实现。齐思和对于教育事业可谓鞠躬尽瘁了。

三

齐思和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他回顾自己上大学学习历史时写道：“我对这两门学问（指中国史和西洋史——笔者）都非常爱好。”从1935年开始执教时起，就同时讲授中国史和世界史，授课之余，从事研究，也是两方面兼顾，一生勤奋，著述不辍。中国史方面论文大都发表于建国前，世界史及其他方面论文大都发表于建国后。中国史论文已择其要者汇编成《中国史探研》，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齐思和对中国史的兴趣起初集中在先秦。他的经学基础深厚，文字训诂之学亦有造诣，加以娴熟外国史事。并且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这些都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于1934年9月在燕大《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发表了一篇《黄帝的制器故事》。此时他还留学国外，文章很可能是他在燕大读书时属稿的。作者广征古籍，排比综合，将黄帝时期的制器传说，分别系于黄帝君臣名下，最后指出，这些发明者皆系传说中人物，这些发明是否出于彼等之手，更难确定。但是文章肯定一点，即此等发明在中国皆有悠久历史与传说之发明者，从而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皆系传自西方的谬论。从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学者深厚的根基和明敏的识见。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古史辨》第七集，近时〔英〕李约瑟所纂《中国科学

技术史》也加以引用。另一篇发表于次年的《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上的《评马司帛洛〈中国上古史〉》一文，读来也似大学期间的作品。

留学归来的十几年间继续从事两周研究，而以战国时期为重点。大量西方史书的阅览和史学理论的接触，使他目光更形敏锐，以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经济、政治和思想几个方面对这一时代进行重新探讨。

他还有志研究周代农业，根据《诗经》的材料，先写成一篇《毛诗谷名考》（《燕京学报》1949年6月第36期）。关于《诗经》中的谷名，历代学者曾做过大量注解考证工作，而以清代程瑶田之《九谷考》和刘宝楠之《释谷》最称精博。在收集材料时，他发现程、刘两氏之作也不免舛错，故为此文，就《诗经》中所见的15个谷名，详加考证，特别是订正了程瑶田以稷为高粱之误，指出稷即谷子（小米），这对研究周代的农业经济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稷是华北地区自古以来的主要食粮，至今已有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了这个事实。文章的这一论断甚有助于理解周人以稷为始祖，以稷为谷神，以社稷为国家的重要意义。文章还对古人食物的品种和制作，做了介绍。这些对于了解古代社会生活均不无参考价值，可以视为对古代文明重新研究的一项成果。

他的另一篇力作是《西周地理考》，发表于《燕京学报》第30期。周人为渭水民族之说，在我国史学界流传已久。30年代初，著名史学家钱穆在《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提出周民族发祥于汾水之说，曾为一部分史学工作者所接受。齐思和“读之而不能无疑焉”，于是“考其地望，论其形势，究其与历史发展之关系，以说明周初文化之背景”。他以大量文献史料论证了钱穆的周人源于汾水之说的“不能成立”，并从周民族的初期迁徙、向外发展以及灭商、分封等活动的地理位置，勾划出周初自西向东发展的轨迹，从而证明周人为渭水民族

之说并无舛误。这一论断至今已为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所证明。

齐思和十分注意对典章制度的考察，特别重视其沿革演变。

《战国制度考》一文（《燕京学报》1938年12月第24期）最能反映他卓越的史识。文中指出：“自〔来〕学者于战国制度不肯措意，而此260年间政治社会嬗变之迹遂晦而不明，湮而不彰。”他研究战国史时，特别注意这一时期的年代、輿地、典章制度诸方面，凡见之于各种史料者，都“详加钩稽，勒为诸表。”本文就是他对所积累的有关制度方面的材料的系统整理。文章就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几个方面进行考查。在农业方面，重视牛耕铁耜的应用和土地关系的变化。在工商业方面，注意货币流行、人口增加、都市繁兴、平民解放与职业分化等问题。在“阶级制度之废除”和“平民之仕进”两个问题上，虽然误以贵贱区分的泯灭即是封建制度阶级组织的瓦解，并以“平民遂获得政治上之平等”来概括当时的阶级关系；但是文章的着重点乃在于考察各国的变法运动和学术的繁荣以及战术的改进等问题。在政治制度方面，则着眼于列国的中央和地方政治结构，指出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趋势。他从纷繁的史料中理出了战国时期历史的端绪，从而为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全文脚注多达400余条，涉猎之广，功夫之深，可以想见。文章的结论指出：“战国时代，诚中国史上，在未与西方文化接触以前，变化最剧烈之时代”；“诚为由古及今转变最重要之关键”。又指出秦朝的制度“大抵因战国时代之旧”，这些看法无疑是超出前人的。

他对于周代的学术思想也颇留意，著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燕京学报》1937年12月第22期）和《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燕京社会科学》1948年第1卷）两文探讨当时社会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的关系。他还涉猎诸子百家学说，撰写过关于农家和兵家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一文

（《燕京学报》1939年12月第26期）以极其雄辩的论据考证《孙子兵法》著于战国而非春秋时代，书的作者虽佚其名但并非孙臆。文章发表30余年之后，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写本《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的发现，为这篇文章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研究工作中，他注重比较的方法，主张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外国史联系起来研究，进行比较，从而发现特点，找出联系。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中，都曾写出这类文章。兹以《孟子井田说辨》为例（《燕京学报》1948年12月第35期）。井田制问题，二千年来众说纷纭，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曾有过一次关于井田制有无问题的讨论，参加人士甚多。齐思和在本文中提出自己的见解。文章指出，参加讨论的各家只争井田之有无，不曾详考后儒论说井田之所本；也不曾将西洋封建制度之田制加以比较，因之愈辩论而去题愈远。他试图“以《孟子》之说还之于《孟子》，《周官》、《司马法》、《王制》之说还之于《周官》、《司马法》、《王制》，后儒之说还之于后儒。更旁稽西洋、日本封建时代之田制，以资比较。”他认为孟子所谓的助法实际上相当于西洋史上的庄园制度。所谓公田，即是西欧庄园中的地主之田，私田即是佃农的耕地，而“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在西方亦复相同。因此，文章认为：“然则助法乃封建制度下田制之通制，孟子不过于此等制度，加以理想化，整齐化，将之由虐民之制，变为仁政之基”。运用这种比较方法，在其他文章中也可见到。例如在《周代锡命礼考》（《燕京学报》1947年32期）一文中，以这一典礼与西欧封建制度下的授封礼及臣服礼相对比，都能加深认识，收到相得益彰之效。

到建国前夕，齐思和年甫四旬，完成有关先秦时期的论文多篇。不少论文由于材料坚实、考察细密，结论至今仍可成立。至于考据文章，由于论据严谨、立说周密，不少见解已形成定论。

40年代之末，齐思和将其研究范围移至中国历史上另一剧烈变化时期，即鸦片战争前后一段。他先从学术思想方面入手，1949年在《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上刊出《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翌年又在《燕京学报》第39期发表《魏源与晚清学风》，而以后面一篇更见卓识。文章指出有清300年间，学术风气凡三变，由清初提倡实学至乾嘉而转为声音训诂，再至道咸又讲求经世之学。“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但是对于这样一位“集前修之大成，开一时之风气”的代表人物，一直不曾受到治清代学术者的重视，因此他为文对魏氏加以评论。文章就魏氏生活的时代，他的经世思想，他在漕运、盐法、河工、兵饷诸大政方面的贡献，关于本朝史事的著述，对于边疆与域外史地的研究成果，对今文学的提倡等各个方面详加缕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魏源的研究渐多。陈耀南在其所著的《魏源研究》（香港，1979年）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从前虽也有人對魏源做过一些评介，“不过，系统而比较全面地考究魏源的著作、事功，以至深入地探索他的学术思想，还是要等到1950年12月《燕京学报》39期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这个里程碑的出现。齐氏盛推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的启蒙大师’，这实在是绝非溢美的内行话。”陈氏并认为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与邓嗣禹在所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中推顾炎武、戴震与魏源为清学三变的代表人物，也是受到齐思和此文的影响。陈氏的评论是恰当的。

院系调整以后，齐思和分工专事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近代开端的研究未再继续下去。正在此时，中国史学会提出一项编辑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他接受了《鸦片战争》的主编任务。鸦片战争前后两次，历时20年，占整个近代

史的四分之一，有关的中外资料，卷帙浩繁，编选工作十分艰巨。他接受任务后，广搜博采，遍及全国各大图书馆及私人藏书家。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资料为例，所收集的史料多达200余种。这些资料包括官修书籍、谕折汇编、地方志书、私人著述、笔记、年谱、诗文等，外文资料方面包罗了英国议会文件，外交档案、私人著作以及新闻报纸等。他从这巨量的资料中披沙沥金，细心选择，然后又对许多材料细加校勘，最后更分门别类，顺序编排，确实费尽匠心。第一次鸦片战争资料于1954年出版后，齐思和又着手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的编选工作，其间几经耽搁，终于在1978年出版。两部合计，达500万字以上，有关的重要史料，大备于是，对于国内外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嘉惠良多。

四

建国后，齐思和从事世界史教学，他的科研工作也随之而转到这方面来，主要集中在西欧封建制度、西方史学史和中西交通三个方面。

关于西欧土地制度和庄园的研究，他取得了不少成果。关于土地制度的研究可以《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一文为代表。过去，治世界中世纪史者每苦于国内收藏原始史料之不足，齐思和撰写此文时，正值〔英〕D·C·道格拉斯主编《英国史料汇编》陆续出版，第1、2两卷收录6至12世纪英国史料共540余件，凡1800余页。他细检埃塞尔伯特、威特雷德、伊尼、艾尔弗雷德、克纽特诸法典，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土地赋役检查书》等重要史料，分析比较，论述了英国封建化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指出了英国与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在封建化过程方面的异同，并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关于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罗马派和日耳曼派的片面观点。过去，我国史学界

在这个问题上一向缺乏研究，一些著作和教材对此，往往语焉不详。他的这篇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根据大量材料，条分缕析，立论谨严，在中世纪史的研究中，洵不多见。

关于西欧庄园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两篇文章。《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度》（《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是一篇教学参考文章，就庄园的起源、组织、土地分配、耕作、地租形态和庄园的瓦解等方面，作了详细的阐述。《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新建设》1964年第10—11期）则是参加当时中国史对唐宋时期是否存在过庄园制度的学术讨论的一篇论文。文章提出了庄园制度的六项基本特征，是在广泛的材料与名家论述中归纳得来的。

对于西方史学史，他留意西方史学界的流派，关心国外中世纪史研究的动态。他在《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5期）一文中，结合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来考察古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和作品，因能做出公允的评价。他还写了一些书评和史学名著的中译本序言，介绍作者、著作及所属史学流派。在《〈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一书的介绍》中介绍了苏联革命前后在英国史研究方面的师承渊源和学术成就。在〔美〕鲁滨孙著《新史学》（商务1964年版）及〔美〕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1961年版）两书的中译本序言中，对于鲁滨孙的“新史学”及其流派做了介绍和批判，并指出该流派在建国前对我国史学界的影响。

最后还应提到的是齐思和在中西交通方面的研究。他主张：“今后研究世界史应当注意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特别要注意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各时代所占的地位以及对世界各国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世界各国文化给予中国文化的影响。只有各个国家的史学家把他们本国史籍中所保存的与世界史有关的资料提供出来，并予以正确的研究，

才能丰富世界史的内容。”他的有关中西交通的文章正体现了这种思想。

在《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一文中，他广泛收集中国史籍有关拜占廷的资料，参考西方学者如玉尔、吉本、夏特等名家的著作，以中国和拜占廷双方史料互相印证，指出自东汉至明初（公元2世纪至14世纪末）之间，两国通使、通商关系，绵延不断，而且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相当密切，从而补足了拜占廷史书的缺陷。文章详细地考察了我国古书所载自拜占廷输入的重要商品，从而更正了西方史学家一向以为在中拜两国贸易中只是由中国单方面输出蚕丝的错误看法。他还详细叙述了中国的育蚕法传入拜占廷的经过，从而订正了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关于波斯僧人偷运蚕子的离奇故事。另外还对拜占廷在东西方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桥梁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该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曾被译成俄文，转载在《拜占廷》杂志上。

粉碎“四人帮”后，齐思和又发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和《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和对西方的影响》（《光明日报》1978年1月5日）两文，这是他在病中整理出的旧稿。匈奴西迁问题——包括匈人的来源和匈人是否匈奴——在西方史学界曾引起长期争辩。过去一些西方学者由于不谙中国史料，像吉本那样渊博的历史学家竟然视匈奴西迁为不可能，而另一些人虽然承认匈人即匈奴，但于西迁经过，仍感茫然。我国近代一些历史家如洪钧、章太炎等人虽然开始注意匈奴西迁的历史，但于欧洲历史所知有限，也未能加以解决，因之从公元91年窦宪破匈奴，北匈奴“逃亡不知所向”，到4世纪70年代匈奴突然出现于东欧，前后280多年的漫长行程，迄无定论。在《匈奴》文中他广泛搜集古史有关材料，参考国内外学者的考证，仔细考察西域地理位置，追踪匈奴行进路线，大体上辨识出

匈奴西迁行迹，并分作四个阶段加以叙述。文章还追述了匈奴在迁徙前的历史发展，并评论了匈奴进入欧洲以后的活动，使人们对这次迁徙的历史看得更加清晰，更加完整。这是齐思和对世界历史研究做出的最后一个贡献。

齐思和先生毕生从事史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成绩卓著。他逝世后，门人弟子曾以：“学贯古今，业兼中外”，“史坛耆宿，后学良师”的挽词来悼念这位历史学家，是十分恰当的。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人民教育出版社

藏园题跋匡正一例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十页“周易注疏十三卷”条云：“宋刊本，半页八行……有陈鱣跋……。此与袁抱存克文藏《礼记》、张香涛之洞藏《书经》、李木斋盛铎藏《周礼》同，皆绍熙黄唐刻本也。”此跋有误。上述四经，即世传“八行注疏本”，因刊地又称“越州本”。其中仅《礼记》原载黄唐刊书跋：“本司旧刊《易》、《书》、《周礼》”、“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鱣正，用镌诸木”。末署“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据此知：

1. 三山黄唐仅董刊《毛诗》及《礼记》，二经版刻年代为光宗绍熙二年至三年（1191至1192）。今《毛诗》久佚不传，《礼记》原本今存，现有1927年潘宗周影刊本行世。

2. 《易》、《书》、《周礼》三经为“本司旧刊”。“本司”指两浙东路茶盐司，黄唐于是司曾官朝请郎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常平公事。“旧刊”当在黄唐绍熙刊刻二经以前。据三经所载陈锡、梁文及毛昌等二百余名刻工证之，三经印版当刊于高宗绍兴年间，与黄刊二经不能并提。

•李国庆•